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修订本)

英汉翻译教程

A COURSE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Revised Edition)

主编 张培基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修订本)

英汉翻译教程

A COURSE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Revised Edition)

主编	张培基	
编者	喻云根	李宗杰
	彭谟禹	

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汉翻译教程(修订本)/张培基主编;喻云根,李宗杰,彭谟禹编.
—修订本.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446-5207-0

I. ①英… II. ①张…②喻…③李…④彭… III. ①英语—翻译—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45390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王冬梅

印 刷: 昆山市亭林彩印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75 字数 306千字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25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5207-0 / H
定 价: 40.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说明

《英汉翻译教程》是 1978 年教育部委托中国人民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为国内高等院校英语专业编写的翻译教材。高等院校英语专业大都设有翻译课,但由于课程的性质和侧重面不尽相同,教师在使用本书时可根据各自课程特点,对教学内容加以适当调整。

本书共分六章。第一章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我国的翻译史;第二章提出了若干关于翻译的根本理论问题;第三章对英汉两种语言进行概括性的对比,揭示其异同,特别着重指出其不同;第四、五、六章通过大量译例介绍了英译汉常用的十五种方法和技巧。各章节后配有大量单句练习,书后又附有大量短文翻译作业材料。学生通过同类问题的反复练习和大量短文翻译实践后,得以巩固翻译知识,掌握翻译技巧。

翻译课的教学任务是向学生传授基本的翻译理论和常用方法、技巧,并通过反复实践培养学生的翻译熟练技能。因此,本书对于古今各家在翻译理论上的争议未作过多的评论,仅在必要时根据编者的理解作一些简要的正面叙述。对各种方法和技巧,主要也是从翻译角度讲述;对原文的语言现象,未作过多分析,教师可按具体教学情况在讲评时加以必要的阐发。

本书在介绍翻译方法和技巧过程中所采用的译例基本上都是脱离整篇原作的孤立字句,这有时会

使所介绍的方法和技巧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整篇原作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离开整篇原作,孤立地研究一个句子或一个词的翻译方法是不大可能的。一个孤立的词的意思往往不同于当它和别的词或词组联系在一起而结成整体时的意思。一个句子也是如此,如果不联系它的上下文和全段或全文的主要思想,我们是不可能把句子译好的。然而,我们又认为,对比研究两种语言在语言文字上最普遍、最典型的特点和差异,提出几种适当的翻译方法和技巧,供学生在翻译课实践中根据原作具体思想内容加以采用,仍然是有很大益处的。因此,对于本书所介绍的各种方法和技巧,在翻译实践中也应根据面临的原作的具体思想内容而加以灵活运用,不应生搬硬套。

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劳动,不同译者对同一个作品可有各种不同的译法,往往因人而异。我们为本书习题所提供的答案和参考译文也同样不是唯一的答案和译文,其目的只是帮助学生学习 and 供学生研究之用。因此,编者建议,不要照这些习题的答案和参考译文去对勘自己的答案和译文,而要把自己的答案和译文跟我们所提供的答案和参考译文作深入的分析和比较。

书中例句大部分选自国外出版的书报、杂志,其中有些译例难免不够妥当,在运用时应注意评判。为了编写、排印及教学上的方便,所选译例大都没有在例后注明出处,而在本书的附录部分另列主要参考资料项目。

本书是高等院校英语专业教科书,同时也是高等院校翻译专业教科书。它也适宜于作为青年翻译工作者或业余翻译爱好者的自学参考用书。同时应该指出:把某种外语译成本族语的翻译工作也很有助于把本族语译成这种外语。不论是外译汉或汉译外,一般都遵循同样的翻译理论原则,而且都会遇到很多性质相同的困难,需要用类似的方法、技巧去解决。因此,本书对于汉译英来说,也是有参考意义的。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了解放以来国内出版的许多有关书刊,从中选用了不少例句,也从国内兄弟院校近年来的实际教学经验中获得了不少启发和教益。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朱树颀同志、刘亚呈同志、许志华同志、许渊冲同志、戴敦复同志、韩德彰同志等对本书分别提出了许

多宝贵意见,上海外国语学院杨寿林同志十分关心本书的出版,付印前仔细审查了全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给予我们很大的促进和帮助。我们谨向以上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派人参加本书最后定稿的单位有: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外贸学院、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广州外国语学院、四川大学、西安外国语学院、河南师范大学、解放军南京外国语学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等。这本书的写成和他们的协助是分不开的,我们在此也一并致谢。

由于编者教学经验有限,水平不高,编写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缺点、错误,希望使用本书的师生和读者不吝指正。

2008年,应出版社的要求,全书已重新作了一次审核,修订处包括大量例句的译文,力求准确、地道,更上一层楼。书后所附短文翻译,修订后也有所更换和更新,以求新为宗旨。

编 者

二〇〇八年九月于北京

绪论

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语言是思维的外壳,人类的思维是由存在决定的,而客观存在是可以认识的,因此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用另一种语言重新表达出来也是完全可能的。

翻译是沟通各族人民的思想,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交流的重要手段,也是进行各种外交活动所必需的。翻译是学习外语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探讨两种语言对应关系的一门学科。

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辩证的。翻译实践是翻译理论的基础,又是检验翻译理论是否正确的标准。科学的翻译理论是前人翻译实践经验的总结,掌握这种翻译理论,有助于我们进行翻译实践。因此,我们既要重视翻译实践,又不能忽视必要的翻译理论。

翻译活动的范围很广,种类很多。按其涉及到的语言来分,有本族语译成外语,外语译成本族语两种;按其工作方式来分,有口译和笔译两种;按其翻译材料来分,有科技材料的翻译,文学作品的翻译(包括小说、戏剧、诗歌等),政论作品的翻译(包括社会科学论文、报告、演说辞等)以及其他应用文的翻译(包括新闻报导、电报、文件等);按其处理方式来分,又有全译、摘译和编译等。为了适应国内高等学校英汉翻译教学工作的需要,本书在扼要介绍一些基本翻译理论知识的同时,着重研究和探讨英译汉的一些具体方法和常用技巧。

目 录

绪 论

第一章 我国翻译史简介 1

第二章 翻译的标准、过程以及对译作的要求 7

第一节 翻译的标准 7

第二节 翻译的过程 9

第三节 对翻译工作者的要求 15

第三章 英汉语言的对比 19

第一节 英汉词汇现象的对比 19

第二节 英汉句法现象的对比 26

第四章 英译汉常用的方法和技巧(上) 36

第一节 词义的选择、引申和褒贬 36

第二节 词类转译法(一) 44

第三节 词类转译法(二) 53

第四节 增词法(一) 57

第五节 增词法(二) 69

第六节 重复法(一) 73

第七节 重复法(二) 82

第八节 省略法 88

第九节 正反、反正表达法 99

第五章 英译汉常用的方法和技巧(中) 109

- 第一节 分句、合句法 109
- 第二节 被动语态的译法 115
- 第三节 名词从句的译法 121
- 第四节 定语从句的译法 129
- 第五节 状语从句的译法 139
- 第六节 长句的译法 148

第六章 英译汉常用的方法和技巧(下) 159

- 第一节 习语的译法 159
- 第二节 拟声词的译法 168
- 第三节 外来词语吸收法 175

结束语 180**短文翻译练习** 182**参考答案** 245**参考译文** 275**附录** 323

- (一) 英汉翻译常用工具书 324
- (二) 英汉译音表 326
- (三) 本书编写主要参考资料 328

后记 330

第一章

我国翻译史简介

A Course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我国的翻译事业有约两千年的光辉灿烂历史。早在西汉哀帝时代,有个名叫伊存的人到中国口传一些简短的佛经经句,但还谈不上佛经的翻译。佛经的翻译是在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一四八年)开始的,译者是安世高。安世高是安息(即波斯)人,他译了《安般守意经》等三十多部佛经。过些时候,娄迦讖来中国。此人是月支国人,所以又称为支娄迦讖。他也译了十多部佛经。支娄迦讖译笔生硬,读者不易看懂,所以从那时起,大概就有直译和意译这一类问题了。他有个学生叫支亮,支亮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号称“三支”,都是当时翻译佛经很有名的人。就在那时,月支派里还出现了一个名叫竺法护的大翻译家,他译了一百七十五部佛经,对于佛法的流传贡献很大。

上述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私人事业。到了苻秦时代,在释道安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翻译事业出现了一大进步,成为有组织的活动。道安自己不懂梵文,惟恐翻译失真,主张严格的直译,因此在他主持下翻译的《鞞婆沙》便是一字一句地翻译下来的。道安在这期间请来了天竺(即印度)人鸠摩罗什。鸠摩罗什考证了以前的佛经译者,批评了翻译的文体,检讨了翻译的方法。他一改以前群家的古直风格,主张意译,改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并提倡译者署名。他的译著有《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中观论》、《十二门论》、《百论》等三百余卷。见到他译的《法华经》的人说,他的译著有“天然西域之语

趣”，表达了原作神情，译文妙趣盎然，为我国翻译文学奠定了基础。到南北朝时，应梁武帝之聘，一个名叫真谛的印度佛教学者来到中国，译了四十九部经论，其中尤以《摄大乘论》的翻译，对中国佛教思想有较大影响。

从隋代(公元五九〇年)起到唐代，是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的时期。隋代历史较短，译者和译经都不多，其中有释彦琮(俗姓李，赵郡人)者，梵文造诣很深。他对于翻译理念，曾有比较透彻的发挥，认为译者应该：(一)“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憚久时”；(二)“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三)“耽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炫”。在他以后，出现了古代翻译界的巨星玄奘(与上述鸠摩罗什、真谛一起号称我国佛教三大翻译家)。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六二八年)出发去印度求经，十七年后才回国。他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主持了比过去在组织制度方面更为健全的译场，在十九年间译出七十五部佛经，共一三三五卷。他不但把佛经由梵文译成汉文，而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是有贡献的，他所提出的翻译标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意即“忠实、通顺”，直到今天仍然有指导意义。与玄奘同时的还有实叉难陀、义净、不空等译者，也都译了很多佛经。唐代末年，无人赴印求经，佛经翻译事业逐渐衰微。

到了北宋时代，在乾德开宝年间，宋太祖曾派人西去求经，印度也派名僧东来传法。以后，宋太宗也曾曾在开封的太平兴国寺内兴修了译经院，从事佛经翻译，但是已远不如唐初的极盛时期。到南宋，记载中已见不到有一部译经。元代虽有拔合思巴、管主八等数人奉诏翻译佛经，但译品只寥寥十数部。在明代二百多年中，佛经译者只有智光等一两个人，译了很少几部经。清代也只有工布查布等五人译了几部佛经。

从明代万历年间到清代“新学”时期，在佛经翻译呈现一片衰落现象的同时，却出现了以徐光启、林纾(琴南)、严复(又陵)等为代表的介绍西欧各国科学、文学、哲学的翻译家。明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清林纾和他的合作者以口述笔记的方式译了一百六十多部文学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

《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等。林纾本人不懂外文,因而他的译作删减、遗漏之处甚多。

严复是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咸丰三年(公元一八五四年)生于福州。他从光绪二十四年到宣统三年(公元一八九八年到一九一一年)这十三年间潜心翻译,所译作品多系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如赫胥黎(T. H. 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亚当·斯密(A. Smith)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孟德斯鸠(C. L. S. Montesquieu)的《法意》(L'esprit des Lois)、斯宾塞(H. Spencer)的《群学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约翰·穆勒(J. S. Mill)的《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甄克思(E. Jenks)的《社会通论》(A History of Politics)等。严复从事翻译并不仅仅尽舌人之劳,每译一书,都有一定的目的和意义,常借西方著名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表达自己的思想。他译书往往加上许多按语,发挥自己的见解。关于严复的翻译方法,鲁迅曾在《二心集》里说过,严复“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严复参照古代翻译佛经的经验,根据自己翻译的实践,在《天演论》(公元一八九八年出版)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严复曾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有人因此认为严复偏重于“达”,把“信”、“达”相互对立起来。事实上,严复曾紧接着解释道:“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所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这说明严复并没有把“信”、“达”割裂开来,他主张的“信”是“意义不倍(背)本文”,“达”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尽译文语言的能事以求原意明显,为“达”也是为“信”,两者是统一的。但严复对“雅”字的解释今天看来是不足取的。他所谓的“雅”,是指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本身的古雅。他认为只有译文本身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实际上即所谓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严复自己在翻译实践中所遵循的也是“与其伤雅,毋宁失真”,因而译文不但艰深难懂,而且又不忠实于原文,类似改编。有人说严复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这个批评

不是没有根据的。不过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严复重视译文文字润饰这一点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由于时代不同,严复对“信、达、雅”翻译标准的解释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许多年来,这三个字始终没有被我国翻译界所废弃,原因在于:作为翻译标准,这三个字的提法简明扼要,又有层次,主次突出;三者之中,信和达更为重要,而信与达二者之中,信尤为重要。因此有些翻译工作者仍然沿用这三个字作为当今的翻译标准,但旧瓶装新酒,已赋予新的内容和要求。例如,他们认为“雅”已不再是严复所指的“尔雅”和“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而是指“保存原作的风格”问题。总之,严复对我国翻译事业是有很大贡献的。

值得提一下的是:在严复出版《天演论》前数年,《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于公元一八九四年在他写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已发挥了他所认为的“善译”的见解。马建忠的善译标准包括三大要求:第一、译者先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异同;第二、弄清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第三、译文与原文毫无出入,“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这些要求是很高的,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他本人专研究语法而没有搞翻译工作,因此他对“善译”的见解,被后人忽略了。

“五四”是我国近代翻译史的分水岭。“五四”以前最显著的表现是,以严复、林纾等为代表翻译了一系列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和文学作品。“五四”以后,我国翻译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共产党宣言》的译文就发表在“五四”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起了很大变化。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作品,特别是俄国和苏联的作品,开始由我国近代翻译史上卓越的先驱者鲁迅、瞿秋白等前辈介绍进来。

鲁迅是翻译工作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他和瞿秋白两人关于翻译问题的通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应遵循的基本翻译原则。他译过许多俄国和苏联的优秀文学作品,如《毁灭》、《死魂灵》等。他与瞿秋白通过翻译实践,总结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鲁迅对翻译标准的主要观点是:“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

作的丰姿。”鲁迅竭力反对当时那种“牛头不对马嘴”、“削鼻剜眼”的胡译、乱译,他针对有人所谓“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而提出了“宁信而不顺”这一原则。当然,鲁迅这条原则有“矫枉必须过正”的意味,但与借此作挡箭牌的“硬译”、“死译”实无共同之处。鲁迅主张直译,是为了照顾输入新表现法和保持原作的风貌。鲁迅和瞿秋白对待翻译工作的态度都十分严肃,至今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一九四九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翻译事业也得到了解放。从那时起,翻译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一直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断迅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在翻译理论方面也日益充实完善。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一)翻译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工作,逐渐取代了抢译、乱译和重复浪费的现象;(二)翻译作品质量大大提高,逐渐克服了粗枝大叶、不负责任的风气;(三)翻译工作者为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逐渐消除了过去各种不良现象和无人过问的状况;(四)翻译工作者不仅肩负着外译汉的任务,同时为了介绍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以及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还肩负了汉译外的任务;(五)对翻译标准的认识日趋统一,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的翻译工作。

但林彪、“四人帮”为了篡权反党,猖狂否定一切文化,阻止我国和外国科学、技术、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使翻译工作一度遭受严重破坏。一九七六年十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后,翻译事业又重新得到了解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号召全国人民为加快四个现代化的进程而努力奋斗。我国广大翻译工作者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通过辛勤的翻译劳动,介绍和交流先进科技知识、优秀文艺作品以及民族文化,为我国四个现代化和世界和平不断作出贡献。

当前的问题是,随着我国翻译事业的空前繁荣,已出现了量与质的矛盾,一方面客观上翻译需求成倍增长,另一方面合格的翻译人才供不应求,翻译水平参差不齐,因此,翻译人才的培养亟待加强。

约两千年的翻译历史已为我们积累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前人的翻译经验,批判地吸收前人从实践中总结

出来的理论、方法,以便继续提高我们的翻译水平,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

思考题

- 一、我国翻译事业的历史有多久?谁是我国古代佛经三大翻译家?
- 二、玄奘对我国翻译事业有些什么贡献?
- 三、如何理解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
- 四、“五四”时期翻译工作的特点是什么?
- 五、鲁迅、瞿秋白对翻译工作提出了些什么看法?
- 六、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工作有哪些特点?
- 七、为什么翻译工作者需要知道一些我国翻译史?
- 八、当前我国翻译事业有哪些问题值得思考?

第二章

翻译的标准、过程以及对译作的要求

A Course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第一节 翻译的标准



翻译标准是翻译实践的准绳和衡量译文好坏的尺度。在第一章我们已简要地谈了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信、达、雅”。为了避免因采用“信、达、雅”这个旧形式而对新内容可能引起误解,我们主张把翻译标准概括为“忠实、通顺”四个字。

所谓忠实,首先指忠实于原作的内容。译者必须把原作的内容完整而准确地表达出来,不得有任何篡改、歪曲、遗漏、阉割或任意增删的现象。内容通常指作品中所叙述的事实,说明的事理,描写的景物以及作者在叙述、说明和描写过程中所反映的思想、观点、立场和所流露的感情等。

忠实还指保持原作的风格——即原作的民族风格、时代风格、语体风格、作者个人的语言风格等。译者对原作的风格不能任意破坏和改变,不能以译者的风格代替原作的风格。原作如果是通俗的口语体,不能译成文绉绉的书面体;原作如果是粗俗琐屑的,不能译成文雅洗练的;原作如果是富于西方色彩的,不能译成富于东方色彩的。总之,原作怎样,译文也应怎样,尽可能还其本来面目。正如鲁迅所说的,翻译必须“保存着原作的丰姿”。

所谓通顺,即指译文语言必须通顺易懂,符合规范。译文必须是明白晓畅的现代语言,没有逐词死译、硬译的现象,没有语言晦涩、诘屈聱牙的现象,没有文理不通、结构混乱、逻辑不清的现象。鲁迅所说的,翻译必须“力求其易解”,也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在通常情况下所必须遵循的准则。但在有些情况下,译文的通顺程度只能与原文的通顺程度相应或一致。例如,在文艺作品中,作者有时有意识地采用或引用一些非规范语言以刻画人物或渲染某种气氛,翻译时就不宜片面追求“通顺”而加以改变,应尽可能地把原著中一些非规范化语言也如实地加以传达。当然这种情况是不太常见的。它往往属于原作整体中的个别因素,我们也可把它当作保持原作的风格问题来处理。

忠实与通顺是相辅相成的。忠实而不通顺,读者看不懂,也就谈不到忠实;通顺而不忠实,脱离原作的内容与风格,通顺也失去了作用,使译文成为编纂、杜撰或乱译。

忠实是翻译标准中的首要问题,它对原作的内容、风格、语言应有全面的照顾。兹各举实例略加说明:

- 1) Any use of the atomic bomb on *Manchurian targets* would be more for purposes of panic than of destruction.

如果要对满洲的目标使用原子弹,这与其说是为了破坏,不如说是为了制造恐慌。

原文中用的 *Manchurian targets* 反映了原文作者的敌对立场和观点,译者为了忠实表达原文的内容,并没有把它译为“东北地区的目标”,仍按原文译为“满洲的目标”。

- 2) *I'm up to my neck in your bullshit.*

你让我倒他妈的八辈子邪霉了。

原文是美国大兵的粗话。译者为了忠实于原作的风格,没有把它译成“你把我害得好苦”,而译成“你让我倒他妈的八辈子邪霉了”,语气与原文一致。

- 3) “*I kep it from her arter I heard on it,*” said Mr. Peggotty, “*going on nigh a year. We was living then in a solitary place, but among the beautifullest trees, and with the roses a-covering our*